

宁镇疆 著

《老子》『早期传本』



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学林出版社

《老子》早期傳本

結構及其流變研究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宁镇疆 著

老子早期傳本結構及其流變研究

學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 宁镇疆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730-111-2

I. 老... II. 宁... III. 老子 - 书籍结构 - 研究
IV. ①B223.15②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298 号

《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著 者—— 宁镇疆
扉页题签—— 张长虹
责任编辑—— 刘 娴
封面设计—— 徐 婕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1-3300 册
书 号—— ISBN 7-80730-111-2/B·6
定 价—— 20.00 元

序

宁镇疆博士的《〈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这部书根据对包括最新资料在内的所有有关资料完整与深入的整理和分析,对《老子》这本书的结构特征及与此有关的《老子》一书形成过程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其方法和结论都不乏新意,相信会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里,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由地下发掘陆续发现了一批又一批古代文献文本资料,其意义极其深远。比如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等多种古代文献的帛书写本,就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代文献较早期文本面貌的了解,促进了对于《老子》等一批重要古代文献研究的深入。但是由于当时所见的大多还只是汉代的资料,对于古代文献的诸多问题尚不足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而自 90 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更大的改观,一些更足珍贵和重要的资料终于出世,一时引起轰动。那就是大家已熟知的 90 年代中接连出土和征集到的几宗分量极重而年代更早的古代文献文本资料的获得与公布,其中包括先后在学术界引起研究热潮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等。这些资料的获得,不仅以其所包含的前所未见的丰富内容为古史研究增添了大量新鲜史料,而且由于其提供了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批古代文献文本实物

资料,对于古代文献问题的整个研究的意义自然是无可比拟的。以《老子》为例,在郭店楚简中就整理出较之帛书本还要早一百年左右的简本《老子》,这对于探讨《老子》形成的早期阶段的问题无疑提供了绝好的考察样本,对于《老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意义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宁镇疆博士的这部专著便是在这样的新的研究条件下,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于《老子》这部古书的结构上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所作的一次新的、深入的研究。由于掌握了新的资料,并吸收了学术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概念,本书在所探讨的诸多问题上,包括《老子》“早期传本”的分章、分篇、章序、篇序等等,都较前人的研究有所推进。而本书在资料运用和处理上的严谨与细致,以及由为分析《老子》“早期传本”结构问题而提出的诸多新的概念所表现出来的逻辑上的缜密性,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应该说,作为在对新资料深入分析基础上进行的关于《老子》结构特征与形成过程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面貌和成绩,对于《老子》研究的开展是有其贡献的。

本书的工作,以及学术界近年来围绕新出土文献所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大量工作,除去与古代的某种特定文献(例如《老子》)有关的意义外,应能促使我们对于认识古代中国文献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作更深入的思考。本书研究的布局,便体现了作者是把对《老子》结构问题的探讨同对于古代书史研究问题的思考相联系的。在《余论》中,本书还特别辟出一节,从“‘类’的区分”、“‘诸书互见’与古书材料来源的多元化”等五个方面详细讨论了“从《老子》结构的演变看古书的流传与形成”这个问题,表明作者对探讨中国古代文献

形成规律问题的深刻关注与思考。这是很值得称许的,应该是本书及其他类似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古史研究有益的又一项或许更重要的意义。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就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现状而言,如何为这项研究建立起真正科学和完整的史科学概念与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有待完成的基础性的任务。回顾中国古史研究的漫长历程及其中的成败得失,人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古史研究的史科学基础问题,始终是决定有关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对于与此有关的诸多复杂问题,长期以来古今多少学者聚讼其中而莫衷一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疑古”的和主张“两重证据法”的这两大方法论立场,便都是为了在近代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的规范的要求上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的发展上都是有重大意义和贡献的,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也都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不断发现的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批实物资料,其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突破性发展才显示出其无可估量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前所未有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真实情况的认识,也促使我们根据对新、老资料的通盘研究,来认真思考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完整的特征。而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解决中国古史研究的史科学基础问题的必要条件是应当对古代文献整体有尽可能全面和完整的了解,并对其形成过程作整体性的思考。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文献不是一些相互孤立的资料,它们在总体上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献传统的产物。我曾经提到过,在对古代事实的记录和叙述上,所有古代文字

资料的表现,都是受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系列规范和传统的、十分发展的文字记录与流传系统的制约的。这些传统的内容包括:具备完善的原始记录系统(史官制度)、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实用文献文本和古书的出现)、具有专业水准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一定意义和水平上的批评系统(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属著作活动的出现),以及文献作为国家政治活动一部分的严肃的地位与品格等。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这些表现是非常具有特点的,是与中国古代发展全部特征有关的一项十分独特的因素。我的这些看法的一个实际意思就是:在将古代文献作为史料来对待的问题上,合乎要求的做法是要把所有的讨论都放在对中国古代文献整体和文献传统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来进行。那种根据局部的、片断的、孤立的特征来处理早期文献问题的做法已经被证明并不能真正解决古代与文献有关的重要课题,反而可能在最终结果上失误;而更重要的是,在局部和孤立的方法的方向上,已经不可能使我们对古代研究史料学基础的基本认识较之前人有实质性的提高,从而真正建立起合乎现代研究要求的史料学概念的基础和规范。所以,追求对于文献问题的整体性的把握,恐怕就成为现代古史史料学建设的一条准则。

正因为这样,我想,在当前陆续拥有新发现古代文献文本资料实物的极其难能可贵的新条件下,在分别对各有关资料作个案的具体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对于中国古代“书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发生、发展的历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很久以来,对于上述这种涉及关于古代文献的整体性认识的要求,人们不仅还没有获得很清晰、很完整的认

识,就是在研究的条件和手段上,在当时也是难以达到的。因为在仅仅能够看到已经长期流传的传世文献文本的条件下,由于资料本身不仅在内容与特征上无法就可能产生的文献学文体问题给出可资判断的独立依据,而且就其整体而言也显然远没有对于古代文献与文献传统的全面的表现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资料。就是在近代,对古代研究的方法问题有极为出色思考的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先生,他们的工作也还因为缺乏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客观条件而留下诸多需要继续讨论的重要问题。而现在,当人们已经能够真正看到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量实物并有条件准确地加以整理和释读后,对于古代书史和古代文献传统过程作高水平的研究就不再是不可期望的事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誉为千古盛事的众多不属于古代实用文献范畴的先秦“古书”文本实物资料的发现,更是使得人们对古代文献总体和文献传统的了解和认识出现很大的飞跃,这必然会推动古代书史和古代文献传统的研究获得有价值的成果,而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古代研究史科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任务也会有真正重大的突破。

宁镇疆博士在从我攻读先秦史博士研究生期间,一直非常用功、刻苦,本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也颇受好评。现在其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也希望因年轻一代学者的这些出色工作,中国古史研究会迎来更大发展的明天。

谢维扬

2005年6月19日

于上海大学

内 容 提 要

《老子》的结构是指《老子》一书的分章、章次、分篇以及篇次。今本《老子》结构的上述诸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的演变及形成过程。本书因此将今本形成以前的、尚处于发展演变阶段、结构上与今本存在或多或少差异的《老子》传本,名之为《老子》“早期传本”。本书以郭店楚简《老子》和帛书本《老子》的个案研究为依托,对《老子》“早期传本”之分章、章次、分篇、篇次等结构方面的表现形态及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初步形成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作为结构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本书首先对结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传世的《老子》版本,首先应该分清其结构是得之古本还是整理者的主观意见。关于帛书本,我们认为它们包括其时的《老子》都是分章的,只是抄写时有不同处理而已。具体地说,帛书甲本《德》篇居一行之中的椭圆形符号基本上都可视为分章符号,而居于一行右侧的三角形顿点则大多是句读符号。关于简本,我们认为它们既非其时的“足本”,也非按照某种“主题”“摘抄”的结果。具体来说,甲乙两组均可视为其时《老子》“分组别行”的具体体现,因此其章序组织就反映了当时《老子》的章序组织水平,而丙组的编排则是随机的。

第二,我们认为古书之“章”最原始和突出的特征是它的“单位性”:一章就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单纯的“意义单位”,这

是构成“自然章句”的关键条件。初始形态的《老子》严格说来还不是“书”，只是“材料”汇编，是零散的语录、格言或心得集结，此时的基本单位是“自然章句”。

第三，与前一点相关，“早期传本”分章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基本上都保留了“自然章句”的痕迹：一章大致上都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拥有相对单纯的“意义”，尚未发生大规模的章次合并。今本一章内意义前后矛盾的情况，大多源于后人的合并。今本意义多有龃龉的章，在“早期传本”中，多是分成几个意义上相对单纯的、短促的小“章”。不过，简本也存在章内“意义”不单纯的现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是由于《老子》本是断续所记的格言或心得汇编，即时性和随意性是突出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将这些断续所记的零章碎句整理成编的过程中，还应该有一次初步的“结集”。关于帛书本，本书以为它的分章仍基本遵循“意义单位”原则，这一点与简本是一脉相承的。但相对于简本，帛书本章内混入了大量的注语或衍文，并因此导致一些章内句子的重组。今本对帛书本分章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方式有二：一是对短句或短章的就近吸纳，二是依“同类集结”原则，将相邻的、具有相似性的两章合并。另外，关于“早期传本”分篇，本书认为今本的两篇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此之前《老子》可能还曾经以类似简本那样的小篇制存在过，今本两篇制的形式只不过是“化零为整”的结果。

第四，本书认为，古书有机的章序组织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次序”的强调，二是要求“同类”的要集结。“早期传本”章序组织的最突出的原则就是“同类集结”：让“意义”相同或相近，以及拥有共同的语词或表达方式的章章次相连。

这种章序的组织原则最终又导致了后来章次的大规模合并：后人正是有感于这些相邻章次所拥有的相通性，才将它们合并到一章之中。《老子》结构上的这种先经过章次相连再合并成一章的模式，代表了古书结构演进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不过，上述“有机性”组织并非一贯到底，而是表现为明显的单元性或“局部性”。与其他古书的章序组织相比，《老子》“早期传本”的章序长期处在一种“低水平”的组织状态，这主要受制于它最初的分章形态。另外，关于“早期传本”的篇序问题，本书认为《德》上《道》下才是两篇制的原始篇序模式，证据除了帛书本、韩非《解老》外，严遵的《老子指归》也很有说明力。

第五，在“早期传本”的演变过程中，存在混入注文以及妄增“同文复出”的现象。这些内容的加入，有时会打乱章内原有的句子组织，因此章内语句的重组就不可避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某些章的章内结构。虽然这些注文及“同语复出”系“晚出”之文，但增入之后章内的意思往往更加丰满，特别是由此带来的章内语句重组也使得章内的逻辑更加圆通。正因此种“优势”，拥有这些“晚出”之文的传本反而更容易被接受，而“真”本却反倒不传。

第六，从《老子》“早期传本”的结构演变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对古书的流传与形成，以及相关的思想史内容有新的认识。对于前者，本书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就结构的演变看，古书成书并非走同一条路线，因此在它们之间作适当的“类”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二，是从“诸书互见”的角度看，像《老子》一类的古书在材料的来源上是多元化的。三，古书的“形成”与它的“流传”形态密切相关。四，古书在

早期之所以能存留下来,倒不在于其版本学上的“真”,而在于其内容上的“优”。五,无论对章序还是分章来说,“以类相从”都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它是《老子》一类古书结构整合的主要形式。关于结构演变背后的思想史内容,首先要关注“同文复出”及注文混入之后对《老子》原有思想的影响;另外,既然《老子》一书存在上述结构演变的背景,我们今天的思想解释,就要尽量避免原来那种侧重于“书”或“章”之“整体性”或“统一性”的习惯思维,首先应完成结构上的“解构”,将其还原为本来的形态,这样思想的解释才能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进行。

目 录

序	谢维扬(1)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老子》“早期传本”界说	(1)
第二节 《老子》结构研究的内容、意义及目标	(10)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15)
第二章 结构研究的前提 ——对相关材料的再讨论	(52)
第三章 《老子》“早期传本”分章研究	(82)
第一节 古书分章体例概说	(82)
第二节 关于判定《老子》分章方法的讨论	(93)
第三节 郭店简本《老子》分章研究	(106)
第四节 帛书本《老子》分章研究	(123)
第五节 从帛书本分章到今本分章的形成	(142)
第六节 《老子》“早期传本”分章的演变	(157)
附论：关于《老子》“早期传本”的分篇问题 ...	(171)
第四章 《老子》“早期传本”章序研究	(176)

2 《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第一节 古书章序体例概说	(176)
第二节 郭店简本《老子》章序研究	(190)
第三节 帛书本《老子》章序研究	(209)
第四节 简本与帛书本章序的比较研究 ——兼论简本与帛书本章序之间的因革关系	(224)
第五节 《老子》“早期传本”章序演变概说	(237)
附论：关于《老子》“早期传本”的篇序问题 ...	(240)
 第五章 余 论	(248)
第一节 从《老子》结构演变看古书的流传与形成	(248)
第二节 与《老子》结构演变相关的思想史内容	(270)
 附录一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279)
附录二 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 ——兼论帛书本在《老子》文本流传过程中 的地位	(295)
附录三 博士论文评审意见书	(309)
 参考及征引文献	(312)
后记	(33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老子》“早期传本”界说

本课题既然以《老子》“早期传本”的结构为研究对象,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便不容回避:《老子》“早期传本”指的是哪些传本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传本才算“早期”?“早期传本”是相对什么样的传本而言的?另外,“早期传本”与后来传本之间有没有相对明确的时间界标?前三个问题都关涉到“早期传本”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最后一个则是对它进行时间无限的问题。

一、“早期传本”的概念内涵

本书将某些《老子》传本认定为“早期传本”,主要是基于这一类《老子》传本结构上的独特性^①。具体地说,就是该类《老子》文本在分章、章序、分篇、篇序等方面尚未形成今本的结构模式。今本《老子》分上下两篇(《道》上、《德》下)、八十一章、以及由此确定的章与章之间的次第关系的结构模式,为传世的绝大部分传本所依遵。“《老子》八十一

① 谈到“早期传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本”。“早期”的当然可算“古本”,但“古本”却不一定具备“早期传本”的特征。比如公认的传世四大“古本”:河上本、王弼本、严遵本、傅奕本(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除严本外,其他三种结构均与今本无别,并不具有“早期”特征。

章”，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在人们看来，《老子》的这种结构模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老聃所亲自奠定，本不存在什么“早期”、“后期”之类的迁延变化。但长期以来，对于通行本《老子》的这种结构模式，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有些传世的《老子》传本的结构与通行本有明显的不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严遵本。严本长期以来被怀疑是“晚出”，非前汉旧本。但帛书本问世以后，学者将其与帛书本比较，发现它们契和之处甚多，其价值又重获重视^①。现今的严本虽仅存其半，但其结构方面异于今本的地方仍卓然可见，据《老子指归·序》^②云：“昔者老子之作也，变化所由，道德为母，効经列首，天地为象。上经配天，下经配地。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其七十二章的分法及上下经所含章数，都可谓别具一格。而且，严本也是以今本的《德》经为“上经”，与通行本正好相反，但却同于帛书本^③。其二，从古到今，有不少学者都对通行本《老子》的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初性”提出怀疑，并有不同的《老子》结构的记载。陆德明《庄子天下篇音义》提到：“老子为关尹著书

① 参见郑良树《从帛书〈老子〉论严遵〈道德指归〉之真伪》，《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43页。

② 该序《道藏》本及《怡兰堂丛书》本作《君平说二经目》，而《津逮秘书》本与《学津讨原》本作《说目》。详见王德有、点校《老子指归》，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③ 对于严本的篇序，学界还有不同意见，见李学勤《严遵〈指归〉考辨》，《古文獻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关于其中的是非，本书后面还有辨析。